

[回族历史研究]

# 明代军卫与回回人

## ——以北直隶定州《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为例

丁慧倩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以明代北直隶真定府定州正德十六年(1521年)《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为主要史料,分析了此次修寺参与者的军卫背景,分别来自定州卫和北直隶其他卫所。笔者认为这正是定州清真寺的特点,即具有强烈的军卫色彩。

**关键词:** 军卫;回回人;定州碑

中图分类号: K281“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86(2012)03-0103-04

明代的北直隶地区是军事布防的重地。自永乐迁都以来,大量军卫由南京等地北调。《明史·兵志》称永乐年间京卫总数达到72个,除了原北平都司迁入的军卫外,还包括原驻于南京的亲军上十二卫和其他20余个南京卫所,以及从河南、北平行都司等地调入的卫所。如按每军卫5600人计算,正军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而这还不包括舍余及其家属。除京师外,北直隶的各府州县境内也分布着大量外地调入或新近添置的卫所。

本文涉及的定州在明代隶属于北直隶真定府。真定府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冲积平原上,滹沱河自西北向东穿越府境,其北面为保定府,西面为河间府。《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sup>[1]</sup>。真定府在内三边长城一线,紧邻保定府,具有一定的军事防御价值。定州位于真定府北部,其辖境北与保定府相接。在军事活动上,定州与保定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定州卫建于永乐年间,领6个千户所。定州卫的旗军与保定、河间两卫一起参与对京师和本地的防御。

保定、真定、河间等地在明代即有回回人居住,这可以从该地存留的清真寺明代碑刻中得到印证。这些回回人的身份包括军、民等不同户籍。由于三地设有军卫驻防,本地回回人中不乏世袭军户。

明代军卫中回回人的活动通常以清真寺的信仰及其实践活动,凸显于其所在的地方社会中。本文从北直隶真定府定州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下简称“定州碑”)涉及的人和事入手,着眼于分析军卫体制与回回人以及清真寺活动之间的关系。

定州碑现存于定州清真寺。其碑文正文收录于1995年出版的《河北省志·宗教志》中<sup>[2]</sup>。2001年,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收录了该碑正文和部分碑阴文字<sup>①</sup>。2002年,马生祥在《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幢古碑之点校》<sup>②</sup>一文中收录了该碑的正文和完整的碑阴题名,其碑阴部分与此后李兴华《定州伊

收稿日期: 2012-07-02

作者简介: 丁慧倩(1978—),女(回族),天津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社会史、回族史研究。

斯兰教研究》<sup>③</sup>一文收录的该碑碑阴内容一致,但更加完整。因此,本文使用了马生祥文中的碑文正文和碑阴题名,正文部分参照原碑略有修订,并不影响对文意的理解。

定州碑文记载了定州清真寺在弘治年间的一次整修过程,以及此后在正德年间试图申请敕额的活动。这块碑由“乡贡进士奉议大夫临安府同知云中马谦”应武平伯陈勳所邀撰写。据清顺治九年《云中郡志》记载,马谦的名字出现在“明乡举”条成化丁酉科(成化十三年,即1477年)下,“马谦,大同人,任云南知州”<sup>[3]</sup>。马谦在碑文中提到定州礼拜寺在元至正年间曾经重建,到明弘治年间武平伯陈勳途径定州拜谒礼拜寺,得知本地教众有修寺意愿但经费不足。陈勳回京后到敕赐普寿寺向“教之缙绅士大夫”募款,筹得“数百金”交于定州“当事者”。第二年修缮完毕,“正殿既新,而前厦、后室、堂阶、两抚、仪门、复道以次而毕”。尔后,定州教众请陈勳代请敕额,“陈公未及行而歿”,其弟陈熹袭爵后,想继其兄志,为定州寺请敕额,遂与礼部侍郎张昱相商,“定寺敕额,先兄有志于请求而未逮,吾欲有以成之,可乎?”张昱回答说“救命未易得。予职宗伯也,天下寺院皆其所司,予且额之”。张昱为定州清真寺题匾“清真礼拜寺”。并“移檄定州卫,命择郡之谨厚有学行者三人以领其事,并查勘得寺原系古刹,仍给札副住持,以荣之焉”。

碑文中提到的武平伯陈勳,于弘治九年(1496年)袭,正德四年(1509年)卒,其弟陈熹于正德五年(1510年)袭武平伯。可见定州清真寺这次修寺活动应在弘治九年(1496年)至正德四年(1509年)之间。《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乙酉“升鸿胪寺卿张昱为礼部右侍郎,仍掌寺事”<sup>[4]</sup>。可知他为定州清真寺题写匾额的时间应在正德十四年六月至马谦撰写这块碑文的正德十六年正月的一年多里。

定州碑的碑文内容和碑阴题名透露出大量与军卫和军户相关的信息,其产生的联系远远超出了定州卫所涉及的地理空间,而这些人他们的活动又同时出现在定州清真寺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为我们探究明代军卫制度的设立和运行对回回人产生的影响提供了机会。

推动这次修寺活动的关键人物是武平伯陈勳。陈勳是陈友的后裔。《明英宗实录》称陈友为回回人,他于永乐元年(1403年)充骁骑右卫中所马军操备,在永乐朝多次随朱棣大军征蒙古。宣德二年(1427年)升为本卫所实授百户,十年(1435年)升本卫所副千户。正统元年(1436年)升为指挥僉事,二年(1437年)升指挥同知,三年(1438年)升都指挥僉事,九年(1444年)充游击将军,又升都督僉事;十年(1445年)升都督同知,充左参将统兵征进湖广贵州等地方,后升右都督;景泰七年(1456年)充总兵;天顺元年(1457年)封武平伯,进荣禄大夫、柱国,二年(1458年)充总兵,往延绥地方,后封流侯;四年(1460年)三月病故。弘治三年(1490年)追封为沔国公,谥武僖<sup>④</sup>。

陈友的子嗣世袭武平伯。子陈能天顺四年(1460年)六月戊辰袭,成化八年(1472年)六月停禄,寻复,十九年(1483年)七月卒;孙陈纲成化二十年(1484年)三月癸丑袭,禄千石,管红盔将军上直,弘治四年(1491年)兼坐扬威营,八年(1495年)三月卒;曾孙陈勳弘治九年(1496年)四月壬寅袭,正德元年(1506年)五月领右府,二年(1507年)二月,三千营管操,四年(1509年)十月卒;曾孙陈熹正德五年(1510年)袭;五世陈大策嘉靖十三年(1534年)闰二月丙寅袭,万历五年(1577年)闰八月卒;六世陈永寿万历五年十二月乙未袭;不过《明神宗实录》中有武平伯陈如松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正月庚戌管理红盔将军,但其世次、袭年无考;七世陈世恩袭年无考,天启五年(1625年)十二月管红盔将军,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甲辰加太子太傅。武平伯的袭封一直持续到明亡<sup>[5]</sup>。定州碑上提到的陈勳、陈熹兄弟,即是第四和第五代武平伯。

事实上,像陈友这样以军功发迹的回回人在明代不乏其人。只不过由于陈友的官职、爵位较为突出,因此记载最为详尽。陈友在正统朝的活动还与京城内清真寺的修建有关。据北京东四清真寺景泰元年(1450年)《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记载,东四清真寺由时任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陈友兴建并获得敕封,“寺成,蒙恩赐额曰清真寺,盖经始于正统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落成于明年五月五日”<sup>⑤</sup>。

北京素有四大官寺之说,指的是敕赐清真寺(现东四清真寺)、敕赐礼拜寺(现牛街清真寺)、敕赐法明寺和敕赐普寿寺4座明代清真寺。除普寿寺外其他3座清真寺敕封的年代都有明确的记载。前文已经提到敕赐清真寺于正统年间由陈友修建。从法明寺万历八年(1580年)《敕赐法明寺重修碑记》记载看,法明寺与东四的敕赐清真寺一样拥有敕封,而且二者的兴建时间也完全一样,“寺成,蒙恩赐额曰法明寺,盖经始于正统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落成于明年五月五日”<sup>[6]</sup>。据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敕赐礼拜寺记》记载,现位于牛街的敕赐礼拜寺自宣德以来多次修缮,成化十年(1474年)由“指挥使詹升题请名号,奉旨曰礼拜寺”<sup>[7]</sup>。

很明显,上述这几座敕赐清真寺敕额的获得与来自都司卫所系统的修寺者不无关系。更多的记载显示,这些清真寺在明代多次重修、扩建的活动也有大量军卫官军参与。例如前引敕赐礼拜寺万历《敕赐礼拜寺记》的碑阴部分开列了参与这次修寺的人员,其中包括京城西南巡捕把总都指挥同知杨应瑞、原任内西巡捕把总都指挥同知杨生宗、神枢五营把总指挥佥事张肃振,以及来自金吾右卫管卫事指挥佥事、五军一营右哨千总指挥佥事、济阳卫亲军掌印世袭指挥使、鹰扬卫后所掌印百户、昭陵卫见任实授百户、济阳卫见任实授百户、锦衣卫实授百户等武官<sup>[7]</sup>。

武平伯陈勋为筹集重修定州清真寺的经费到北京的敕赐普寿寺向“教之缙绅士大夫”募款。从定州碑阴题名看,参与此事的官员除了武平伯陈勋、陈熹、礼部右侍郎张昱外,还有保定副总兵张勇、御马监太监马臣、李洪、倪英、马敬、都督同知马澄、尚书监太监何江、丁俊、桑尔、鸿胪寺卿舍诚、大兴卫百户马佐、马继祖、鸿胪寺序班王景、马谏、中书舍人吴卿、密云右参将杨恭、锦衣卫指挥马让、金吾卫指挥田艾、穆高、旗手卫指挥梁右、肖钊、锦衣卫千户马仁、杨全、马良俊等人,从中可见军卫官员多有参与。

碑文称陈熹“掌后府事”,所谓“后府”指的是后军都督府。《明实录》上对陈熹的记载,在正德八年(1513年)以前没有提到他任职的情况。正德八年正月他被任命为五军营左掖。十六年(1521年)十二月又命他在不妨碍五军营本务的情况下,兼管围子手上直。第二年,即嘉靖元年(1522年)九月“侍卫前军都督府管府事武平伯陈熹,以贪肆为言官所劾,得旨革任闲住”<sup>⑥</sup>。因此,陈熹在正德年间何时“掌后府事”不见于实录记载。定州卫为后军都督府在外卫所,如果陈熹确有一段时间掌后军都督府事的话,他对定州清真寺请敕额活动的积极参与似乎更加名正言顺。

定州碑文内容对定州以外参与修寺的卫所军官记载较为详尽,这恐怕与撰文者受陈熹的邀请有关,陈熹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资料。不过定州卫军卫官军的参与应是同样重要,毕竟他们是这座清真寺的日常使用者。定州碑上提到的“州钦差都司张公”早在陈勋到来之前,就与教众商议修寺事宜。那么这位“张公”是否为碑阴题名开列的保定副总兵张勇呢?《明宪宗实录》记载张勇为金吾右卫带奉都指挥佥事<sup>[8]</sup>。弘治九年闰三月“戊辰铨注金吾右卫带俸都指挥佥事张勇于福建都司,大兴左卫带俸都指挥佥事徐福于福建行都司,俱掌印管事。”<sup>[9]</sup>到正德九年七月“戊子以金吾右卫带俸都指挥佥事张勇充副总兵,分守保定地方”<sup>[10]</sup>,直到正德十四年被革<sup>[11]</sup>。《福建通志》对福建都司弘治、正德年间出任都指挥佥事人员的记载中有张勇之名,称其为三河人<sup>[12][137]</sup>。《四镇三关志》对真保镇镇守总兵官员的记载中,称张勇为京卫人<sup>[13]</sup>。由此可知张勇为三河人、金吾右卫军官。张勇于正德九年至正德十四年任职于保定,在这之前他于弘治九年出任福建都司都指挥佥事。武平伯陈勋袭职的时间是弘治九年至正德四年。这个时间段内,张勇尚未出任保定副总兵,他应该在福建都司任上。因此,张勇与陈勋在保定一带活动的时间不相符。不过,从实录记载看,张勇并不是从福建任上直接调任保定的,我们不清楚其在福建都司任职的具体截止时间,以及他在任职保定之前的其他职务。有鉴于此,“州钦差都司张公”是否为张勇仍需存疑,待日后进一步查证。

张勇在福建任职期间,参与过当地清真寺的修建活动。据福州清真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重建清真寺碑记》记载“国朝以来……莅兹土者如都督马公澄、都阉张公勇……辄加整饬,嵘然壮观。”<sup>⑦</sup>

碑文中提到的“移檄定州卫,命择郡之谨厚有学行者三人以领其事”,也有有力地证明定州清真寺的活动与定州卫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相信碑阴题名中的本寺掌教、副掌教和其他教众中有大量定州本地回回军户。定州清真寺修复之后,教众希望为该寺申请一个敕额,于是请托陈勋。虽然没有成功,但礼部仍援引成例给清真寺掌教(即住持)以札副,使其获得官方的承认。

从定州碑的记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明代北直隶地区清真寺发展的轨迹:穆斯林因宗教活动而修寺,在反复修建的过程中,来自本地的官、军、民力量与京师及周边地区的资助者相结合。由于北直隶是军卫驻防重地,教内的达官显贵,尤其是军卫官员成为修寺的重要支持者。在定州清真寺的修建过程中,武平伯和定州卫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定州清真寺的军卫色彩尤为突出,这在北直隶地区的明代清真寺中极具代表性。

注释:

①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页,碑文文字和标点均有校注、调整。

②马生祥《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幢古碑之点校》,载《回族研究》2002年第3期。以下定州碑引文皆出此文,不再另作

注释。

- ③李兴华《定州伊斯兰教研究》,载《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0页。该文收入李氏著《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1年。
- ④参见《明英宗实录》《明宪宗实录》《明史·陈友传》。
- ⑤碑文内容及对该碑修撰年代的考证,见王东平《北京东四清真寺“敕赐清真寺”考》,载《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
- ⑥《明武宗实录》卷96,正德八年正月乙酉,第2027页;《明世宗实录》卷9,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壬辰,第339页;卷18,嘉靖元年九月丙寅,第553页。
- ⑦余振贵、雷晓静主编《中国回族金石录》,第70—71页。碑文同时收录于答振益、安永汉主编《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7—128页。石碑存于福州清真寺内。引文据原碑略有修订。

参考文献:

- [1]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4·北直五[M].北京:中华书局,2005:589.
- [2]河北省志·宗教志:卷68[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184—185.
- [3] (顺治)云中郡志:卷8·人物志·选举·明乡举[M].
- [4]明实录·武宗实录:卷175·正德十四年六月乙酉[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401.
- [5]明史:卷107·功臣世表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3244—3246.
- [6]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89.
- [7]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9册)[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59.
- [8]明实录·宪宗实录:卷283·成化二十二年十月丁丑[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787.
- [9]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11·弘治九年闰三月戊辰[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026.
- [10]明实录·武宗实录:卷114·正德九年秋七月戊子[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321.
- [11]明实录·武宗实录:卷124·正德十年闰四月庚申[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482.
- [12] (乾隆)福建通志:卷21·职官[M].
- [13] (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8·职官考·真保镇职官·武阶[A].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10[Z].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479.

## Junwei and Hui Muslim People in Ming Dynasty

——Focus on the Stele of the Reconstructed of Mosque in Dingzhou, Pecheli

DING Hui-qi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Focus on the Stele of the reconstructed of Mosque in Dingzhou,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army background of the temple participants who were from the Dingzhouwei and other Weisu in Pecheli.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is Dingzhou Mosque's characteristics. It has strong army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Junwei; Hui Muslim People; the Stele of Dingzhou

责任编辑:马金宝